

的人 悉生 熟陌

易 准 著

花城出版社

熟悉的 陌生人

易 准 著

化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典型问题历来是个敏感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广东评论界围绕长篇小说《金沙洲》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典型问题是论争的焦点。这场论争影响深远。本书收入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和《文艺批评的歧路》等文章,对这场论争中“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今读来仍觉新鲜。文集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塑造典型人物的关系,以及创作的宽广道路,作了正确的阐明;对创作自由、歌颂与揭露、题材及观念更新等问题,都有重要的阐述;对贩运“洋教条”的“新思潮”作了一针见血的评析,指出:那种生吞活剥、照搬国外五花八门的创作方法、评论方法的“新探索”,有可能成为新的教条主义的危险。同时还评论了欧阳山等一批老中青作家的作品,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个别有错误倾向的作品,也发表了有理有据的批评意见。

所收文章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对了解广东文学史很有史料价值。

熟悉的陌生人

易 准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插图 190,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140册

ISBN 7-5360-0663-2/I·605

定价: 4.50元

序

杜 埃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和《文艺批评的歧路》这两篇评论，是六十年代初期被认为是批评当年即已流播的“左”的文艺思潮的力作。纵然那时有不少人对庸俗社会学的那些僵死、狭窄的框框很有意见，但见诸评论文章者并不多，这与整个社会思潮所形成的局面是有联系的。固然，建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不容否定的方面；但同时也产生了“左”的偏狭症，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之后，这种偏狭症续有发展，这是另一个方面。当时文化艺术的领导部门已有所察觉，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领导下发起了反对文艺上的“五风”（共产风、放卫星、浮夸风等等），对鼓吹“人人唱歌”、“人人写诗”、“人人演戏”、“人人作画”……等口号进行了严肃批评；在文艺理论上，《文艺报》发表了解冻式的《题材问题》专论，批评了被教条主义弄得创作题材越来越狭窄的冻结趋向。除此之外，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也对教条主义如“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等等“左”的理论偏向进行纠正。我当时也和各省代表一起

参加了座谈。事实说明在文艺上也是有反“左”的，并非一贯来都受“左”的支配，否则，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不可解释的。这里编入萧殷和易准合写的就当时讨论于逢反映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金沙洲》所出现的“左”的偏狭论点加以批评的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文艺理论工作者并非从头到尾全是姓“左”。尽管如此，历史事实也给了我们有力的说明，在全国范围来说，反“左”的历史很短，而“反右”的时间则很长。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曾几何时，每次反“左”，很快却又来了反右。由不停的运动和社会思潮构成的整个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是难于以某些个人的见解和力量而转移的。我国文学艺术所走的道路既是光明的又是曲折的。这种“左”的思潮后来为林彪、江青所利用，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百花齐放变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则是“听江青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所走过的道路何止是曲折的？它简直遭遇了灭绝生机、枯萎死亡的巨灾大难。如果不是后来新的党中央拔除了插在十亿人民背部的凶毒的芒刺，进行了拨乱反正，则亡党亡国亡文亡人的结局是不堪想像的。

“熟悉的陌生人”是俄罗斯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对文学创作典型形象的一句非常深刻、富于形象性的概括语言，是对文学写作者很有启迪意义的名言。典型形象问题在我国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因受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界就出现一种非常偏狭、僵滞的论点，使我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受到各种掣肘和束缚。不解除这种桎梏，社会主义文学就难以发展。当时对长篇小说《金沙洲》人物典型问题的辩论和《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这篇文章的立论及其批评，都是非常及时而富有

现实意义的，它打开了僵滞的创作思想，给作家带来了活力。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反映合作化生活的小说作为立论对象（评论家对历史上的合作化是不能回避的），但它所接触到的“左”的论点和进行的批评，它所阐明的创作上有关典型人物塑造问题的方方面面——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对当时有其现实意义，即使对今天的文坛总结了正反两面经验之后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对新一代文学创作者来说，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文集内《文艺批评的歧路》一文中所指摘的四个混淆，也是文学评论上带根本性的问题。与《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一样，它所阐述的这些根本性问题不受时空的影响和限制，尽管它所列举的例证多是三十多年前合作化时期的东西，但它对今天的初学写作者和文学欣赏者来说，仍然有其论述的生命力，仍然有其参考、学习的价值。

近作《警惕洋教条》，虽是几百字的短文，但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之在中国，似乎得天独厚，极易滋长。土的、老的教条主义已是客观存在，自不必说；近几年引进的与中国国情相悖的某些西方文艺观，对于某些人来说，也颇有形成为新的教条的危险。”针对时弊，语重心长，值得文艺界深思。

现在有部分“探索者”，似乎失去了方向，脱离了中国革命传统基础，醉心探索欧洲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甚至把腐朽捧为神奇、新鲜，离开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需要去进行“探索”和贩运。对精神文明建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不感兴趣。因此，文集内《把精神灯火拨得更亮》一文是有针对性的，对那些不谈社会主义文学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只谈文学创作是表现“自我”、“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同志来说，是起警醒作用的。党中央在

十二大报告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这个战略高度决定了我们文学的根本性质、任务、方向和文艺家的奋斗目标。读读这个报告，体会一下这个报告的精神，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写作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文集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的关系，以及创作的宽广道路，作了正确的阐明；对创作自由，对歌颂与揭露，对题材和观念更新等问题，都作了必要的阐述，给年青的读者朋友和青年写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意见。这些意见连同前面好些篇章，都有同样的阅读价值。

除此之外，作者对老作家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万年春》，于逢的长篇小说《金沙洲》，岑桑揭露“四人帮”死党的中篇小说《躲藏着的春天》，以及一批中青年作家如王杏元、杨干华、吕雷等的作品，作出了热情洋溢而又实事求是的评价，帮助读者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些作品的主题意蕴和写作手法。作者也评点了林振勇的《白撞雨》和《老点点》两个短篇小说，使我想起了这位当年在佛山医药公司工作的新作家，他的第一篇作品《白撞雨》发表后，我也觉得他很有创作才华，曾在六十年代初约见过，是个很朴实的青年工人，多年未见他继续发表作品，情况也不了解，是件遗憾的事。易准同志注意到了他，应该鼓舞他继续写下去。他有生活，有技巧，特别是用那么短小的形式，能把一件事、一个人物生动地写出来，跃然出现在读者面前，具有立体感，这是难得的。借此机会，也和对许多新知旧雨一样，祝愿他和他们拿出更多的作品来，为我们南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画卷增添新的色彩。

1989年4月于朱村

目 录

序.....	杜 埃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1
不要错贴了标签.....	21
把精神的灯火拨得更亮.....	30
对创作自由、歌颂揭露与时代精神问题 的思考.....	38
对题材、高质量与观念更新问题的思考.....	55
首先做一个革命者 ——和业余作者谈深入生活问题.....	73
发挥广东华侨题材的优势.....	79
关于传统剧目的整理问题.....	85
文艺批评的歧路.....	96
艺术方法与批评尺度 ——评《站在什么角度上》.....	114
“辩护”的积极意义在哪里？ ——关于旧版《金沙洲》的艺术构思问题.....	121

浅谈通俗音乐的评论问题.....	139
------------------	-----

警惕洋教条.....	147
------------	-----

“生活手记”谈片.....	149
---------------	-----

也谈“几副笔墨”.....	152
---------------	-----

庄严的使命.....	155
------------	-----

永远鞭策自己.....	157
-------------	-----

遵将令.....	160
----------	-----

坐而谈与起而行.....	162
--------------	-----

百花盛开 与民同乐.....	166
----------------	-----

鼓励、鞭策与期望	
----------	--

——寄语广东赴京演出团.....	169
------------------	-----

《一代风流》的压轴戏	
------------	--

——欧阳山的《万年春》读后.....	172
--------------------	-----

论《金沙洲》.....	187
-------------	-----

杨干华和他的小说.....	207
---------------	-----

美与刺的和谐统一	
----------	--

——读杨干华的短篇小说集《惊蛰雷》.....	218
------------------------	-----

新人前进的足印	
---------	--

——读吕雷的短篇小说.....	224
-----------------	-----

纵情歌颂 大胆暴露	
-----------	--

——读岑桑的中篇小说《躲藏着的春天》.....	232
-------------------------	-----

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	
——《金沙洲》的反面人物及其他	237
晶莹透亮的童心	
——读《鸡鸣茅店月》	243
读《老点点》	250
喜读《白撞雨》	254
评点两则	257
县委书记的生动形象	
——读《生产队的“勤务员”》	260
两个对立的农民形象	
——读王杏元的《铁笔御史》随感	264
激流中的舵手	
——读高缨的《黄莺展翅》	268
评《春天的童话》的错误倾向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272
后记	282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小说《金沙洲》的讨论，是广东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讨论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金沙洲》这部作品的范围，而涉及到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典型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读者曾展开热烈争论，其中不乏正确的立论，同时也有极其片面的见解。但无论如何，这种针锋相对的辩论，对于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探讨艺术典型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讨论的启发下，我们也想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千虑之一得，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种不宜忽视的创作阻力

在这次讨论中，有些文章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要求艺术的典型形象必须与总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与社会的、阶级的本质相一致。这种倾向，在不同的文章中各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加以归纳，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把艺术典型仅仅归结为社会的、阶级的本质特征，而丢掉了典型的个性特征。但其表现形态不一，有的以阶级本质的抽象概念来阉割人物的个性；有的直接以自己主观设想的某种政治条件来鉴定人物；有的拿国内一些优秀作品的主人公跟自己评价的人物简单地加以对照；有的则拿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作标准，要求艺术形象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模一样。

其二，是把艺术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看成是数学的总和，两者只有外在的联系，而不是有机的统一体。因此在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就舍弃了个性而空谈共性。

其三，是把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割裂开来，离开了典型环境而孤立地分析人物性格；或者以生活的主流来硬套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把典型环境抽象化和简单化，结果也和前者一样，抽空了作品的典型环境的具体内容，使人物性格游离于环境之外。

凡此种种，都表明对典型理解的混乱。其共同特点都是离开了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脱离了作品的客观实际，既不分析生活，也不分析作品；而是从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抽出几条本质或规律加以对照或硬套，把艺术典型的创造看成是赤裸裸地“写本质”“写主流”的同义语，在艺术典型与时代精神、阶级本质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是由于忽视了艺术对现实认识的特点和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规律，对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环境与性格等问题作了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理解，没有看到其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

这种倾向，不只是表现在《金沙洲》的讨论中，在对其他作品的评论中也同样存在着；不仅过去有过，现在也仍然存在，因此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批评倾向，不但不能正确地阐明艺术典型的复杂现象，反而变成了一种创作的阻力，对文艺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这种能力。由于篇幅关系，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可能对上述的每一个具体论点都一一加以分析，我们只想针对它们的实质，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化，需要概括和反映生活的本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次讨论中的主要分歧，并不是典型形象要不要反映社会（阶级）的本质，而是怎样才能反映这种本质的问题。是用图解某一阶级本质的概念和公式来表现社会（阶级）的本质呢，还是遵循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通过具体的、富有个性的形象，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呢？——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虽然没有在理论上要求《金沙洲》的作者把时代精神和社会（阶级）本质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他们用以观察、评价作品人物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实际上正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往往脱离了作品的实际，以各种抽象的本质概念来要求人物，而不问人物的实际性格如何。例如一谈到刘柏，就要求他一定要具有“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和宏伟气魄”，以及“奋发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胆泼辣的工作作风”，似乎农村中的党

的支部书记，就只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典型，好像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典型了。我们认为，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个性，艺术上就可以产生千差万别的典型性格。既可以有完全没有缺点的理想人物，也可以有有缺点的正面人物，既可以有具有全新的思想风貌的农民党员干部的形象，也可以有正在改造、转变和成长中的农民党员干部的形象。《金沙洲》中的刘柏，既然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所塑造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就只能以他所固有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出现于作品中。《金沙洲》一开始就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总支书记黎子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和郭细九等上中农的破坏活动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尖锐的斗争和复杂的情况下，刘柏始终保持冷静和沉着，他一方面怀着尊敬上级的心情，对黎子安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希望他能够倾听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又通过社员群众的辩论，揭露郭细九等的破坏活动，给予有理有节的反击。在郭有辉的种种幕后的破坏活动尚未充分暴露以前，他怀着曾经和郭有辉一道战斗过来的真挚的阶级感情，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对他进行劝导、批评和教育，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和自己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把社搞好。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期待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花生地风潮中，他虽然受到各种挑拨性的攻击和谩骂，却仍然苦口婆心地说服群众，使一场带着宗派情绪的人为纠纷平静下来。而当高级社遭遇经济的困难，郭有辉等正偷偷从社里抽走投资的时候，他却以身作则，毅然把自己一家生活所赖的分配收入全部投到社里去；并且机智地突破了富农和新上中农的关口，使他们不得不对社投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刘柏的踏实、稳重、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能够顾全大局、

任劳任怨、一心要把高级社办好的优良品质，显示了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面。至于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某种程度的焦急、苦闷和忧虑，如果从金沙社当时的混乱局面和他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他的生活经历来看，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但无损于这一人物的性格，反而显示了他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于金沙社命运的深切关怀。作者正是通过人物的这些心理活动，从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揭示了人物的感情世界，使形象的血肉更加丰满，更能显示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一个人物，尽管还不能成为理想人物的典型，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作者在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付出的劳动，是不容随意抹煞的。至于作者为什么把刘柏写成这样而不写成那样，为什么赋予他以这样的性格而不是那样的性格，则是为整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和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如果离开了这一切，主观地要求刘柏必须具有这种精神或那种品质，势必会阉割掉人物生动的个性，使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而按照这种要求推论下去，也势必会得出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在一个历史时期只能产生一种典型、一种性格的荒谬结论。

文学艺术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所谓个别，就是具体的典型形象。只有通过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才能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阶级）的本质和规律。阉割了人物的个性，人物的阶级本质也就无从表现。正是这种个性与共性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物完整的性格。有人说，梁甜“一面希望重温幸福的爱情生活，一面又摆脱不了封建意识的束缚；她拥护高级社，是因为家庭贫困，非依靠社不可，又怕拖累他人，思想上又有矛盾。在人社问题上看不到她具有远大的理想。因此，她不能成为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农村妇女干部的典型”。这种分析显然是脱离了生活实际和缺乏辩证观点的。梁甜，作为一个失去了丈夫而要一肩挑起一家四口生活重担的善良的女性，处在解放前早已形成的带有传统封建习俗的特定环境中，她在爱情问题上所表现的封建意识和对于生活的忧虑，怕拖累人家而甘愿默默承担生活的重担；背地里暗暗流泪以抒发个人的不幸的悲哀；这一切表现，正是她抒发自己千端万绪的复杂感情的独特方式。而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面临着要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她怀着对于曾经帮助她解决了生活困难的初级社的眷恋和对于未来生活的惶惑，在入社问题上表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情，这是符合于她的生活经历、觉悟程度和性格特征的。这种来自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生活经验和习惯的复杂心情，未必就不能体现贫农这一阶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别林斯基说得好：“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20页）其所以是熟悉的，是因为作家对于这一类型人物的阶级特征作了高度的概括；其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作家赋予人物以丰富的、独特的生命——鲜明而生动的个性。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这里就包涵着某种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梁甜的性格，固然还没有达到这样高度的典型化，但作者所赋予她的独特的生命——个性，却是相当鲜明的。作者正是遵循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通过梁甜性格的塑造，概括和再现了贫农阶层中这一类型的贫苦农民的命运和遭遇，揭示了她（他）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离开了这一人物独特的性格、遭遇和命运，离开了她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全部复杂的精神世界的细致分析，

是不可能理解人物的性格，透视人物的阶级本质，也不能作出是否典型的结论的。硬要梁甜在入社问题上具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脱离了作品和人物的实际，而且也背离了艺术规律，取消了以个别反映一般，也就取消了典型的存在。

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是由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话中，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人的阶级性，即共性，是绝对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第二，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两者是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有机的统一体，绝不是外加的数学总和，更不是互相游离、互相排斥的东西；第三，人物的个性，由于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是千差万别的，这一个绝不同于那一个。同一阶级的共性，只能